

利玛窦汉译工作中的操控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肖清瑞, 葛文婕

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天津

【摘要】利玛窦是明末清初时期引领西学东渐、传播西学科技的重要传教士之一,对其能成功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原因进行剖析,能够让中国翻译史学习者对该时期翻译史有着更加透彻的认识。本研究旨在以安德烈·勒菲弗的操控理论为理论框架,深入分析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汉译西方著作过程中所采取的操控策略及其动因。研究聚焦利玛窦在华期间进行的代表性翻译工作,探讨其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为达成传播西学与天主教义的双重目的而实施翻译操控。研究方法主要基于操控理论的核心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结合具体汉译文本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利玛窦的汉译实践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操控力量共同作用下的“改写”,这种操控策略虽成功促成了西学东渐初期的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并为其传教活动创造了条件,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译介内容与其原意的偏差。

【关键词】西学东渐; 利玛窦; 操控理论; 翻译策略; 意识形态操控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2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23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84

An analysis of manipulation in Matteo Ricci's Chinese translation work and its causes

Qingrui Xiao, Wenjie Ge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Abstract】 Matteo Ricci was a pivotal missionary who facilitated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disseminated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his success in introducing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enables learner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to gain deeper insights into translation practices of that era. This study employs Lefevere's Manipulation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manipu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Italian Jesuit Matteo Ricci in translating Western works into Chinese and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Focusing on Ricci's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 projects in China, the research explores how he implemented translational manipulation within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o achieve the dual objectives of spreading Western knowledge and Catholic doctrines. The methodology centers on the core elements of Manipulation Theory—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supported by case studies of specific translated tex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Ricci's translation practice essentially constituted a "rewriting" shaped by multiple manipulative forces under historical constraints. While this manipulation strategy successfully fostere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early phase of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created conditions for missionary activities, it inevitably led to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translated content and its original meaning.

【Keywords】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Matteo Ricci; Manipu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strategy;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1 引言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亦称“西学东来”)逐渐盛行,西方的学术思想于此时期较为集中地传入中国。而这些西方学术著作的汉译工作“作为中国人了解、学习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关键媒介和窗口”^[1],也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中国在翻译领域的成长。因此,西学东渐可称为中国翻译史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脱去袈裟,换上儒袍,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他一改过去传教士“西僧”的面貌,用“合儒易佛”的方法在中国传播

西学^[2]。作为西学东渐的奠基者与核心人物, 他的汉译活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科学、哲学与宗教知识, 其独特的“适应”策略更是开启了中西文化深度碰撞与调和的先河。然而, 利玛窦来华时中国正值明朝末期, 儒家思想依旧为中国各阶层主流文化, 但其却能够以天主教传教士身份在中国传教, 同时传播西学, 因而利玛窦在西学文本的翻译中采取的适应策略值得深入探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1945-1996)于20世纪中期提出的操控理论(Manipulation Theory), 较为系统地解释了翻译活动与历史、文化及社会的关联, 与利玛窦的适应策略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可作为本次研究的理论框架。

本文将着眼于利玛窦来华后所进行的多项汉译工作, 对其中的操控策略进行剖析。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强化中国翻译史学习者对利玛窦翻译实践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解, 更能为其学习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运作、文化协商与知识重构提供经典案例, 最终让他们对明清时期科技翻译, 乃至整部中国翻译史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2 利玛窦汉译背景及翻译操控理论介绍

利玛窦来华传播西学所引发的第一次西学东渐激发了我国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热潮。然而其受封建制度严格把控的儒家思想是导致西学汉译不得不“操控”的原因。因此若想研究西学汉译中的操控, 对彼时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剖析必不可少。

2.1 利玛窦来华汉译背景

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时正值明朝末期, 由于明朝自身的政治弊病, 彼时的中国社会政治动荡, 科技发展迟滞。然而由于当朝皇帝万历帝尚且年幼, 明朝的一代名相张居正(1525-1582)得以整肃朝堂, 实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 强调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为逐渐僵化的晚明社会带来一些活力, 也为利玛窦等西方人士来华传教、传播西学, 乃至整个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创造了可能。同时, 部分士大夫不再满足于宋明时期空谈心性的理学, 转而寻求经世致用之学, 为西学传入提供了思想缝隙。

利玛窦作为第一位真正进入中国社会的传教士, 其首要目的并非向中国传递西方科学知识, 而是为保障殖民主义而进行传教, 为其殖民扩张提供思想支持^[3]。然而, 中国并非当时西方殖民国家可以随意控制的蕞尔小国, 因此利玛窦等传教士不得不考虑中国社会文化情况, 将传教内容与中国当时所需的西方先进科技内容进行融合, 即采用“学术传教”策略; 同时, 为确

保其传播内容能产生足够影响, 利玛窦将其传播的内容受众定位明朝精英群体, 即士大夫阶级, 而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相对较重, 因此利玛窦在进行汉译时, 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操控手段, 并与明朝官员合作翻译, 以确保其译文的可接受性。

2.2 翻译操控理论介绍

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操控理论指出, 翻译本质上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三重因素的制约^[4]。他认为, “翻译是对源语的改写”^[4], 改写的目的在于使文本符合目标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 从而被其接受, 跨越文化鸿沟。这与利玛窦在传播西学时为确保其可接受性所采取的“适应”策略不谋而合, 因此用于本文相关分析较为适当。

3 利玛窦汉译工作中的操控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 利玛窦能在彼时与西方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中国进行西学传播, 其汉译工作必然使用了翻译操控手段。本节将从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重控制因素: 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三个方面, 选取利氏汉译实例, 对其操控现象及原因进行分析。

3.1 利玛窦汉译中由赞助人导致的翻译操控

赞助人是文学系统的双重操控因素之一, 其是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 又有可能妨碍、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 如宗教集团、阶级、出版社等。利玛窦能够来华传播西学, 必然不是孤军奋战, 而是受到来自不同层面“赞助人”力量的支持和制约, 其中主要包括其作为传教士所供职的耶稣会, 以及其来华后结识的徐光启(1562-1633)等明廷士大夫官员。

赞助人对利玛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汉译选材上。受其耶稣会传教士身份的要求, 其传递的西学内容必然包括宣扬神学和宗教教义的书籍, 如其天主教义解读著作《天主实义》。然而, 其另一主要赞助人: 明廷士大夫官员为其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使利玛窦不得不在传播宗教内容时, 也带来西方先进科技内容, 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军事技术、生理学、医学和文学等, 以吸引士大夫的注意, 换取传教的可能, 其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便是其一。利玛窦来华后, 与彼时刚考取进士的徐光启结识, 并希望向他传递天主教教义, 然而徐光启的关注点在于实学, 只是对利玛窦带来的西方科学很感兴趣, 因此为满足徐光启的要求, 进而向其传教, 利玛窦最终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与徐氏完成了《几何原本》(前六卷)的合译工作。该书的译入是西方几何学第一次被较

为系统地引进到中国,得到了当时中方赞助人的推崇。其中的公理化理论,更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深远^[5]。同时,利玛窦在与徐光启的多年翻译合作中,也直接或间接地与徐光启讨论天主教相关内容,最终于1603年促成徐光启入天主教,成功做到了以“适应”策略传教。

3.2 利玛窦汉译中由意识形态导致的翻译操控

意识形态是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译者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不仅会影响到译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还会影响译者对原文翻译策略的选择。明末时期的中国,儒家思想占据社会主流地位,对当时意识形态影响极为深厚。因此利玛窦在进行西学汉译工作时,也不得不选择避免在意识形态上与之发生冲突,引起中国读者,特别是其主要赞助人——精英阶层读者的不满。

利氏汉译中受到意识形态操控最经典的案例之一便是其《天主实义》中对于至高神“Deus”的译法。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先后将“Deus”译为“陡斯”“天”“天主”“上帝”等,导致其译名较为混乱,不利于天主教义传播。利玛窦在遍读历代经典后发现,先秦典籍中隐含有至上神——“上帝”的概念,如《诗经》大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但同时,受当时教育制度影响,中国普通大众对“上帝”了解程度不高。因此,在他所著的《天主实义》中,利氏将“天主”一词作为“Deus”的对应,并根据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赋予其新的内涵。他认为天地有主,即造物主,而且只有一主。这也符合儒家敬天的思想。同时他也指出,“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6]在与受到良好教育的士大夫阶层讨论教义时,利玛窦便会转用“上帝”作为“天主”的同义词,以期用他们更为“熟悉”的语言更准确地传达“Deus”的含义。利玛窦拒绝采用佛教色彩的“佛”或“神”,也并未采取直接硬译之流的异化方法将其处理为“陡斯”,转而引用《诗经》《尚书》儒家经典,论证“上帝”与“天主”的同一性,进而凸显天主教与儒家伦理的兼容性。表面上看,利氏此举是为了更好“传播天主福音”,但究其根本,其仍是受彼时中国强大的意识形态主流要求的限制,而不得不进行翻译操控,在哪怕一个词的翻译上也要再三斟酌,以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之道。

3.3 利玛窦汉译中由诗学因素导致的翻译操控

诗学操控的本质是文本形式对目标文化审美期待的适应性改造,这意味着利玛窦必须将西方著作的论述方式语言风格全面纳入士大夫熟悉的文体系统中。

这在前文提到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之《几何原本》中有所体现。此处选取《几何原本》中对“点、线、面”的定义与原作进行比较,由于徐、利译作的原文为所用的底本是德国数学家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 1537—1612)编撰的拉丁文本《欧几里得原本十五卷》(*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V*),本文添加托马斯·希思(T. L. Heath)所译英文译本,以便于理解。

“点”的定义:

拉丁语原文: *Punctus est cuius pars nulla.*^[7]

英语译文(希思译本): *A point is that which has no part.*^[8]

汉语译文: 第一界, 点者无分。^[9]

“线”的定义:

拉丁语原文: *Linea vero longitudo sine latitudine.*^[7]

英语译文(希思译本): *A line is breathless length.*^[8]

汉语译文: 第二界, 线有长无广。^[9]

“面”的定义:

拉丁语原文: *Superficies vera est quod longitudinem et latitudinem solam habet.*^[7]

英语译文(希思译本): *A surface is that which has length and breadth only.*^[8]

汉语译文: 面者, 止有长有广。^[9]

作为传递数学“原本”的定理性内容,徐、利并未对其进行过多文学化修饰,而是尽量采取直译策略,如将“point”“line”“surface”分别译为“点”“线”“面”,不仅准确地传达了原文含义,更是确立了中国数学界沿用至今的标准术语。但是,他们却并非完全进行了字对字的直译,而是考虑了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即诗学因素,对译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例如在原文中,此三条定义仅为顺序排放,并未明示其顺序。徐、利在译文中添加了“第一界”“第二界”等排序性词语,使这三者相互间由小到大的关系得以显化,更加符合汉语的体裁习惯。此外,拉丁语作为屈折语,喜用词缀扩展词语含义。例如在“线”的定义中,拉丁语在表示广度的词“latitudine”加以否定前缀“sine”表示“没有宽度”之含义,英译本的“breathless”也用一个单词以表达此含义。但汉语对一句话中的动词数量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因此其更偏爱使用动宾结构。此处徐、利二人将其译为“有长无广”,使用两个简短的动宾结构精准地传达了原文含义,同时非常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属于较为成功的诗学操控,进而促进译文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

4 结语

利玛窦的汉译实践生动展现了翻译在跨文化传播

中的本质,它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语言转换,而是特定历史情境下赞助人、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三重力量共同作用的语言“改写”。这也为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撑。虽然利氏汉译远早于该理论的提出,但其汉译工作却处处体现出翻译操控的痕迹。这种操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西方科学、哲学和宗教思想突破晚明的文化壁垒,促成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的“西学”接受,打开中西文明对话的通道;另一方面,这种深度归化的翻译方法也导致传播内容与其原意产生较大程度的偏差。被削弱的天主教核心教义、剥离宗教背景的科学知识、经儒家伦理过滤的西方思想,都让彼时中国人对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初见产生了一定的偏差。

从其翻译目的看,利玛窦的操控行为是一种受多方限制而不得不做的必然,而操控行为也确实让利玛窦成功在中国立足,传播西学,包括传教。然而,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如今的世界,早已不像利玛窦来华时那般“各行其是”,而是愈发变成一个整体。作为身处这样一个高度联通的时代之中的翻译学习者、研究者与实践者,我们或许可以降低操控的程度,不再和四百余年前的利玛窦一样向“适应”妥协,而是选择让译文读者能够沉浸于外国文化之中、体验异国风情,直至真正做到让译者“不可见”,不对原文进行任何主管改动,而将原文的本真带给读者。研究翻译史,但不能局限在已成为历史的翻译方法中,值得每一位翻译实践者铭记于心。

参考文献

- [1] 杜运泉.近代西学东渐中的翻译出版及其当代启示[J].中国图书评论,2018,(11):99-106.
- [2] 信美利.由内而外:意大利历史文化变迁与对华交往[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45(05):92-113+177-178.
- [3] 王佳娣.后殖民译论下的明清来华传教士翻译策略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6(10):108-109.
- [4] 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5] 张必胜.晚明科技翻译与中国知识转型[J].中国外语,2024,21(06):102-109.
- [6] 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7] 克拉维乌斯.欧几里得原本十五卷[M].罗马,1574.
- [8] 欧几里得 著,希思 译:几何原本[M].武汉:崇文书局,2022.
- [9] 徐光启.徐光启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